

從國家教育政策看華文教育的挑戰 —以新加坡南洋大學為例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as a challenge of Chinese education— A study of Nanyang University in Singapore

Yu, Yu-Ting¹

¹ Department of Applied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摘要

南洋大學是一所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大學，由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陳六使捐資興辦，可視為凝聚東南亞華人期望的高等學府，用二十五年的歲月成就新加坡華語文教育的傳奇（1955-1980）。新加坡在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施行雙語教育政策，目的為凝聚新加坡國人意識。是此，南洋大學在辦校過程中受現實因素影響，促使學校進行改制，其興衰不僅應視為體制的改變，更應看作國家政策與華人傳承華文教育精神的拉距戰。本研究將從當代社會背景、國家政策進行探討，嘗試建構新加坡南洋大學對華語文教育的傳承精神，以及國家教育政策對華文教育的挑戰。

Abstract

Nanyang University was a Chinese university founded by Tan Lark Sye, who was then the chairman of the Singapore Hokkien Association. It had been acknowledged as a promising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among ethnic Chinese and had spent 25 years (1955-1980) before becoming the legend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 Singapore adopted a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hoping to achieve identity cohesion among the people of Singapore. Therefore, Nanyang University was faced with various difficulties, resulting in policy reform. Its rise and fall were not merely the changes of the system, but should be seen a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Singapore's national polic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This study analyzes in terms of sociocultural context and national policy, attempting to reconstruct the spirit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Nanyang University, and presents the challenges national educational policies have posed on Chinese education.

一、前言

1980年，南洋大學被併入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大學是當代海外唯一一間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大學，¹其辦校宣言為四項宗旨、兩項特質：²

1. 為中學畢業生廣開深造之門。
2. 為中學培植師資。
3. 為本邦造就專門人才。
4. 為適應人口增加及社會經濟發展之需求。
5. 溝通東西文化。
6. 發展馬來亞文化。

在改制的演進過程中，於1980年正式退出歷史舞台，不復存在。然而，昔日南洋大學的存在除了象徵新加坡華人社會致力於華文教育的精神以外，更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傳承。是此，南洋大學的興衰不僅是體制上的改變，應看作國家教育政策與華人傳承華文教育精神的拉距戰，具深入探討的必要性。南洋大學的辦學歷程受到國家教育政策的影響，國家教育政策的脈動與當代社會背景息息相關，而社會背景又與政治情境相互牽引。基此，南洋大學的興衰與政治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文將針對「社會背景與國家政策」、「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挑戰」進行討論。

二、社會背景與國家政策

李光耀曾說：「華文很敏感！語文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新加坡身處馬來海洋之中，我們必須認清這個事實。」³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南洋大學不論是在英殖民政府時期，或是以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政府時代，皆未受到府方的積極支持。對國家領導者而言，華文在新加坡這個由多元民族組成的國家，不僅是傳遞知識的載體，更隱含著深層的政治意涵。談及語言和政治的互動，O'Barr曾提出這二者的關係可分為三種：其一，語言影響政治。政府或個人透過語言政策的操弄以便影響政治權力的分配（例如：雙語政策或單語政策），或是促成政治目標的達成（例如：族群和諧或單一族群的支配）。其二，政治影響語言。政府或民間力量為了政治上的目的，透過語言政策企圖介入溝通體系或語言議題。其三，語言與政治兩者相互影響，也就是呈循環倚伏的（recursive）關係。一方面政治力量決定著語言政策的輸出項（output），同時，語言政策分配也進一步對政治的運作有影響（outcome）。這是上述兩種因果關係的結合，也最貼近現實。⁴以南洋大學所在的時空背景而論，語言與政治兩者相互影響的模式是存在的，華文蘊含的文化與歷史意義在政治

¹ 海外：中國大陸、香港、澳門、臺灣之外的大中華地區。

² 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馬來西亞：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1990），15。第1點至第4點為創校宗旨，第5點至第6點為創校特質。

³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台北：時報出版，2015），61。

⁴ 轉引自施正鋒，〈語言的政治關聯性〉，收於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56。

的催化之下，促使國家政策的策立導向不利於華文學校生存的路途。在華文教育限縮的歷史洪流中，南洋大學是備受衝擊的代表之一。

（一）創校維艱：充滿挑戰的政治環境

宏觀當時新馬地區的政治環境可以得知，南洋大學作為一個傳承華文教育的高等學府是充滿挑戰的。二戰之前，英殖民政府對於新馬地區的華文教育偏向順其自然發展的寬鬆態度。二戰之後，國際情勢轉變，連帶影響東南亞地區的政局，共產勢力的發展令英殖民政府對於新馬地區的治理趨於謹慎。英殖民政府擔心共產黨利用華文教育作為宣傳思想的途徑，因而相繼端出不利華校營運的政策，對華文教育造成產生負面影響。以大環境而言，既存的華文中學及華文小學皆面臨轉型的壓力，更遑論從不利於華校的環境中，創建一所華文高等學府。雖然 1946 年頒佈的十年教育方案（The Ten-Year Program）肯定了母語教育的重要性。然而，1947 年頒佈五年教育補充計畫（Supplementary Five-Year Plan），卻是倡導英校教育的起始，聯帶壓制華校發展。同年頒佈《學校註冊法令》（The Laws of the Colony of Singapore Volume 5），賦予註冊官掌控學校存亡的權力，更進一步威脅華文教育的發展。⁵1950 年至 1953 年間，華校學生人數的增長幅度遠不及英校。針對性的教育法令已經壓縮了華文教育的發展空間，而禁止兩地人民來往的移民政策，更使華文教育面對師資短缺、學子升學無門的困境。培養本地師資和為華校畢業生尋求深造出路，成為華文教育續存的途徑。為此，福建幫領袖陳六使分別在 1950 年和 1953 年提出華人自辦大學的建議，以此來解決華文教育面對的窘境。⁶陳六使積極奔走之下，創辦大學的計劃終於獲得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及新馬地區華社支持。然而，英殖民政府卻持保留態度，憂心共產思想擴張是其一，當局力推以英語為教學媒介語的方針是其二，華人自辦大學無疑是對政府的挑戰。1953 年 1 月 28 日，英國政府委任的馬來亞大學校長薛尼肯因和馬華公會主席陳禎祿在電台進行辯論。陳禎祿指出新大學將為新馬 40 萬名華校生提供升學機會，培養菁英，這個龐大的數目是馬大無法容納的。英國政府卻不為所動，其反對任何「違反政府要建立一個團結的馬來亞政策」的大學成立，並相信華校生可以在馬大獲得升學的機會，也堅持華校生應該盡力學好英文，進入馬大。⁷當局提出的反對理由還包括對南洋大學的教育成效持消極看法：⁸

1. 新大學在水準上將比不上馬大，因此學生的學位資格會被雇主和專業機構輕視，導致這些學生產生挫折感。
2. 新大學將發展成一所不符合英國標準的大學。
3. 華族對英文教育的興趣將降低，因為以華文便能進入該所大學。
4. 大學裡的教師和理事，缺乏足夠的能力管理與穩定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輕學生。
5. 新大學的成立將導致華人捐助馬大的款項減少。

⁵利亮時，〈1950 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興大歷史學報》（2006，17），537。

⁶利亮時，〈1950 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533。

⁷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95。

⁸利亮時，〈1950 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541-542。

當局抨擊華人辦校之際，同時釋放利多消息，以降低南洋大學辦校的必要性。包含在馬來亞大創辦中文學院，並提供獎學金給中文系的學生，使學費低於南洋大學。除了英殖民政府及政府官員的反對浪潮外，馬來社群及部份來受英文教育的人士亦投書報刊抨擊，主要意見如下：⁹

1. 馬來亞有馬大一間大學已經足夠，再設另一所大學只會分散捐款和影響馬大的財源。
2. 華人自辦大學會破壞種族團結和妨礙國民教育的制定。
3. 南洋大學成立後，教學人員和學生之來源將是一大問題。
4. 質疑中文的價值以及存在的意義。
5. 南洋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海峽時報》的一篇報導〈聯邦的非華人譴責種族大學〉中，使用了強烈的字眼，稱吉隆坡的非華人組織不喜歡在馬來亞建立華文大學的計畫。他們認為這將使華人與其他民族的關係永遠處在偏狹的狀態，他們堅持任何文化機構應該在馬來亞國家的架構下建立。¹⁰身為東南亞地區最高華文學府，其對華文教育的立場與新馬政治發展有不可避免的糾葛。南洋大學的發展與新加坡的政局演變有密切的關聯，當南洋大學努力爭取其學術地位時，新馬地區之政治發展極速變化，英殖民地政府的離開，新馬自治地位之獲得，以及隨後新加坡獨立，在在影響南洋大學的發展。¹¹即便政治環境、教育政策不利，民意造成的輿論浪潮不斷。然而，華社對南洋大學的創立充滿希望及信心。南洋大學基金籌募運動獲得東南亞各地華僑之熱烈支持，大學籌備委員會收到數十封裝有支票的信件，作為支持該項計畫之初步捐款。捐款人雖有若干為工商鉅子，但另有許多屬於薪水階級，以平日積蓄所得捐助大學。¹²華人社群的情緒沸騰，加上政治局勢的不穩定，使得英殖民政府不願與華社正面衝突。最終，殖民政府默許南洋大學的逐步創立。值得注意的是，當局只准許南洋大學依照《1940年註冊法令》註冊，名為「南洋大學有限公司」。創校之初不得以NANYANG UNIVERSITY申請註冊之現象，透漏南洋大學日後走向的不確定因素。

（二）改制：尋找華校生存的平衡點

南洋大學的落成與開學備受華社期待。慶祝校舍完成的一系列活動中，華人團體在數周內向大學委員會捐贈現金達一百萬美元，想見其受華社重視之程度。¹³然而，承如前一小節所言，當時新加坡地區的政治充滿不穩定因素，使得南洋大學被置於國家政治的框架下，不能純粹地被看作傳道授業的華文學府，而是被視為孕育共產思想的地域。對此，校方屢次重申辦學理念，並謹慎回應政治問題。開學典禮的相關報導中亦提到南洋大學的委

⁹利亮時，〈195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540。

¹⁰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 1953-1968〉（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58。

¹¹古鴻廷，〈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改革與關閉〉，《南洋問題研究》（2003，1），6。

¹²泛亞社新加坡廿一日電，〈南洋大學籌募基金華僑捐助踴躍〉。《民聲日報》中華民國 43 年 3 月 23 日：C2。

¹³中央社新加坡卅日專電，〈南洋大學昨日盛會慶祝校舍完成〉。《民聲日報》中華民國 47 年 3 月 31 日：C4。

員們提醒學子：勿涉政治、遵守校規。¹⁴ 在國家力量與校方立場拉鋸之中，南洋大學試圖尋找平衡點並進行改制，它的改制是一個長遠而不間斷的進程，希冀能續存華文教育的精神。為了評定南洋大學並作為政府改組南洋大學的立言基礎，辦校過程中，府方曾發表《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魏雅聆檢討委員會報告書》及《王賡武報告書》，這三份報告書影響了南洋大學的改制歷程與走向。

《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發表於 1959 年 7 月 23 日。南洋大學正式開學後不久，時任新加坡教育部長的周瑞麒指出：南洋大學未向政府申請頒授學位的法定權利前，其文憑不應被承認。1957 年 11 月 13 日，南洋大學行政委員會致函新加坡政府，建議聘請國際著名學者組成大學評議會，對大學的學術水準進行審查，並表明南洋大學願意接受該評議會之調查。《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的檢討焦點為南洋大學的行政及教育設施，而當局卻將其引用作為否認南洋大學文憑的參考，引起華社反彈。此外，南洋大學學生認為該報告書中對學術水準的評議有失公允：首先，評議會所謂世界公認的標準，缺少堅強的教育原理的憑藉和實際情況的根據，而基於這種空洞標準所做出的對南洋大學學術水準的不利報告是欠妥的。其次，它抹煞學生四年的辛勤和努力，學生的主觀力量是驚人的，往往在最困難的環境中能創造各種有利條件來提高本身的學術水平。其三，評議會在尚未實際檢驗南洋大學學生程度之前，便以為南洋大學學生程度不夠水準，進而作出否定性的建議有失允妥。¹⁵並非全體華社皆反對該報告書，亦有部分華人視此為改革南洋大學的催生劑，使南洋大學辦學更優質。該報告書引起華社及學生不滿主要肇因於他們認為該委員會調查不足，在學校成立之初即對南洋大學教學品質及承認文憑作出否定的看法，推測其背後有政治意圖，非為單純客觀的報告書。

《魏雅聆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發表於 1960 年 2 月 10 日。由於《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引起華社反彈，新加坡政府再度委請魏雅聆醫生等人組成委員會審定《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以及南洋大學改組的程序與範圍。《魏雅聆檢討委員會報告書》針對學校人員任用、理事會權責等提出數項客觀的建議，但其整體精神仍不脫《白里斯葛南洋大學評議會報告書》的軌跡。曾有熱愛南洋大學的人士投稿至《星洲日報》，指出：「魏雅聆醫生報告書所建議的南洋大學改革方案，從頭到尾只是以目前的馬大為藍本來改組南洋大學。這個建議根本忽略了南洋大學創校的歷史背景與宗旨，等於建議外科手術來治療傷風……」、「第二個誤會是關於南洋大學教學用語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於南洋大學非常重要，因為南洋大學的創校動機就是為了這個。南洋大學的創辦人並不是對馬大的辦學精神有什麼歧見，唯一的另起爐灶的原因只是因為馬大不能收容由華校畢業出來的華語學生……」¹⁶然而，隨著新加坡教育部長楊玉麟表示政府方原則上認同《魏雅聆檢討委員會報告書》的見解，形同為南洋大學改制留下伏筆，更加深華社對政府有意願改變南洋大學教學媒介語和控制南洋大學理事會的疑慮。

《王賡武報告書》發表於 1965 年 9 月 11 日，主要內容為檢討南洋大學學制、師資任用等，並建議南洋大學改用三年普通學位學制及增設榮譽學位，以及提出關閉南洋大學是

¹⁴英倚泉，〈南洋大學開學以後〉。《民聲日報》中華民國 45 年 3 月 24 日：C3。

¹⁵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81。

¹⁶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28。

合適的選項。《王賡武報告書》引起爭議的主因如列：其一，批評註冊名稱。南洋大學最初在時機不允下被迫用《南洋大學有限公司》註冊成立。王賡武以此批評南洋大學，南洋大學支持者難以接受。其二，師資任用。戰後的國際情勢不穩，又為了維持南洋大學華文教育與華人文化的特色，儘量聘用能夠用華語教學的人才，校方只好往臺灣及香港招聘師資，雖然許多教師的學位非來自英聯邦，但不能因此否定教師的專業水平。南洋大學認為，《王賡武報告書》以此批評南洋大學師資來源並不恰當。其三，教學媒介語之爭。王賡武指出：只精通華文，僅能帶給小部分畢業生的優勢，而且，南洋大學繼續造就這類畢業生並不符合國家利益。王賡武將教育與國家利益劃上等號，令華社不滿。¹⁷

依序在時間軸上發表的三份報告書，對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以華生為授課對象的南洋大學產生重大影響。南洋大學在教學區域的主要變革如下：

1. 1966年，施行新學位制。¹⁸

南洋大學原為普遍教育的四年大學體制；而新學位制仿英國體制，分「普通學位」與「榮譽學位」兩種。前者採用學分制，修滿108學分視為合格並獲得學位，如經五年未修滿則不得授予學位。後者不採學分制，凡三年內獲得普通學位且成績優異者，得攻讀榮譽學位，考試合格後分別授予一等榮譽學位、一等（甲級）榮譽學位、一等（乙級）榮譽學位。

2. 1975年，除中華語文一科外，其餘學科改採英文為教學媒介語。¹⁹

南大的改制過程中，教學媒介語一直是重要焦點之一。華文本是該校的重要訴求，卻在政府提出「適應社會環境」的要求中一再調整語文政策，最終被迫以英文為主要教學用語。²⁰

1980年3月7日，新加坡總理李光耀先生致函時任南洋大學理事會主席黃祖耀，討論南洋大學問題，並列舉三個選擇：第一，新大和南洋大學合併為一間國立大學；第二，合併為國立大學，但維持二個校園；第三，在聯合校園的三年過渡期屆滿後，讓南洋大學重新開辦。南洋大學理事會與畢業生協會等皆發表聲明，希望南洋大學繼續存在，因為它代表了華人重視中華精神的展現。然而，南洋大學的積極爭取仍無法改變結局。1980年4月5日，南洋大學理事會正式接受李光耀建議，與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學退出新加坡的教育舞台。²¹其中，《王賡武報告書》被認為衝擊力最強，因為其對於這間年輕的大學並非提出正面的肯定，而是傾向關閉作終。以內容而論，該報告書的著眼點是國家的穩定，卻不可避免的對華文教育造成打擊。它沒有給南洋大發展初衷的機會，並將南洋大學帶往改制與式微的道路。

¹⁷唐漢明，〈王賡武報告書筆下無情〉。轉引自《新加坡文獻館》〈<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5779>〉。閱讀日期：2016.04.26。

¹⁸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36。

¹⁹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74。

²⁰古鴻廷，〈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改革與關閉〉，《南洋問題研究》（2003，1），15。

²¹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75-77。

（三）李光耀政府的態度

1958年，人民行動黨在建國四週年紀念特刊《教育政策問題的國家路線》中指出：「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則，追根究柢是源於政治目標和立場。」如果政治立場是以種族為本，那麼，教育政策就以種族為出發點；如果政治立場是以國家為本，教育政策同樣反映這個立場。²²南洋大學的改制過程除受到新馬地區政治因素變遷的影響之外，李光耀及其為首的人民行動黨亦扮演重要的角色。李光耀限制華文教育及華校，並將其逐步改制為以英文為教學語的制度被認為具有政治意圖，不離削弱左派溫床的意念。陳六使及其領導的福建會館被李光耀認為具有親共的意圖。對政府而言，南洋大學的獨特性在於其不僅是華校，更是華文最高學府。南洋大學辦校初期，正值馬來亞政權，當時該校的生源遍及新馬二地。其中，華僑中學辦學出色，被譽為傳統華校的典範之一；而南洋大學吸收了許多華僑中學的畢業生。與此同時，親共組織中包含中學生的年輕團體，參與者中亦不乏華僑中學的學生。學生們進入大學之後，自主思考及活動力更強。是此，學生群來自整個馬來亞的南洋大學被當局擔憂其勢力過於龐大，並將之與共產黨劃上等號。1980年，新加坡政府進一步將華社辛苦創辦的南洋大學併入新加坡大學，成為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的一環。在在顯示，南洋大學是華文教育受到國家立場左右的印證。李光耀本人亦承認雙語政策與南洋大學改制存在政治原因：南大時代的終結，使鄰國鬆了一口氣。《馬來西亞前鋒報》一篇談論南洋大學和新大合併的文章，如釋重負的地說，這將「自動剷除中國人的認同」。²³李光耀認為：南洋大學學生和支持者不明白語言不只是溝通的工具或教學媒介語，其中牽涉到更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課題。在對南洋大學學生發表的數次演講中，李光耀再再強調南洋大學必須被接受成為一所馬來亞人的大學，而不是華人大學，才能在馬來亞以及東南亞成功。華文可以是使用的語言，但不可以是唯一的語言。此番言論可以看出其政治考量。然而，語言除了是一個民族的生命力，亦是該民族的內涵。是此，對華人而言，華文教育至關重要。以政治考量及國家利益為首，而抹滅孕育中華文化的南洋大學，在施行方法上難令華社接受。李光耀在晚期的言論中平衡了對南洋大學的看法：雖然南洋大學最終失敗，但其精神卻值得新加坡人珍惜並世代傳承下去。不論學習華文對現今的新加坡人有多困難，都應該邁開步伐並持之以恆，必能受益無窮。

三、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挑戰²⁴

（一）華文式微的年代

²²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50。

²³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94。

²⁴本文論述主軸為南洋大學，故本節討論的「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挑戰」範圍為：南大洋大學所處時代的華文景況，及關閉該校對新加坡華文教育的影響。其餘新近年代的華文教改事項不在本文進行詳述與處理。

南洋大學的關閉並非直接與新加坡的華文教育成功與否劃上等號。然而，它具有一個時代的象徵意義，代表在國家政策領導下，華文教育式微的縮影。南洋大學從改制到關閉（併入新大）隱喻著華文的失落年代。

首先，雙語政策的不均衡發展。由於新加坡曾經歷英國長期殖民統治，即使主政者更迭，國家的政治、經濟、法律等多沿襲大英帝國體制，因此英語一直都是一枝獨秀，作為官方的主導語言(master language)。²⁵雙語政策的概念可追溯自 1959 年，直到 1979 年《吳慶瑞報告書》發表後，更確定英文為主、華文為輔的雙語教育比重。1987 年，國家進一步統一語文源流，全國學校（特選學校除外）以英文為第一語文，母語為第二語文。這般情勢不利於華文教育的傳承。許多講華語或方言的家長對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有濃得化不開的情節，他們無法理解為何英國人統治時期，他們的兒女至少有選擇「完全接受華文教育」的機會，而在自己的民選政府管理下，兒女卻必須學英文。²⁶自李光耀主政新加坡政府開始，雙語政策最為人批評的一點為：這項政策實質上並非雙語並重，而是單方面向英文傾斜。又，這種雙語學習模式有可能造成學生僅著重英文，華文退步的情形；或是兩種語言皆無法學習到成熟的狀態。舉一例言之：²⁷

2004 年 11 月 26 日《新明日報》報導一位精通華文的洋人貝文凱(Michael Bailey)跟一名華族的大學講師交談，發現他的英語語法有諸多毛病，貝文凱想，這名講師一定還精通其他語言，怎麼知道，這名講師卻是連華文字一個都不識，貝文凱感慨地說：華人說的是新加坡式的英文，外國人聽不懂，中文又不會，兩頭不著岸，真是可悲！

是以社會大眾檢視新加坡華文水準不如以往的原因，多歸因於雙語政策的成效不彰。除了雙語政策的單面傾斜外，南洋大學的關閉在實務上亦帶來幾個層面的影響。該校的創校宗旨是培育華文中學師資及為中學畢業生廣開學習之門。南洋大學辦校的歷程中為新馬兩地培植了穩定源流的華文師資，該校不存在後，首當其衝的是華文師資來源及華文中學生升學管道的間斷。易言之，南洋大學走入歷史等同於失去孕育華文的搖籃。教育是百年大業，關閉南洋大學對華文教育的影響也許不會一時浮出檯面，卻在新加坡華文能力衰微的現象中展現出來。李光耀曾經對此發表相關言論，認為新加坡人應繼承自強不息、艱苦奮鬥的南大精神，並進一步肯定華人學習華語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再者，南洋大學為期二十五年的歷程中，學位問題一直存在。筆者認為，文憑問題從學校草創時期受限以註冊公司法令成立，即可看出端倪。就南洋大學的角度而言，南洋大學培育出數屆畢業生，其中不乏至世界各國求學並獲得高級學位者，證明南洋大學培育社

²⁵吳英成，〈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

<http://www.ntcu.edu.tw/taiwanese/ogawa100/a/tsuliau/14.%E5%90%B3%E8%8B%B1%E6%88%90-%E8%AC%9B%E7%BE%A9.pdf>。閱讀日期：2016.05.25。

²⁶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71。

²⁷李明旭，〈對新加坡雙語政策和華文教育的思辨〉。《李明旭的個人空間》〈

http://blog.huaxia.com/html/20/709720_itemid_3191.html〉。閱讀日期：2016.04.25。

會人才，作為一個教育機構，有盡到為國家作出積極貢獻的義務。然而，1959年3月4日，南洋大學法令在新加坡立法議院通過，而於同年5月27日在政府憲報頒布實施，從此，南大成為一間在法律上被承認的大學，按國際慣例，一間大學被承認後，其學位理應被連帶承認，才符合邏輯，但當局並沒有這樣做。²⁸文憑認可一事與政治操作有關。國家對華文教育的態度直接衝擊學生的就業問題。以華文授課的大學畢業生，如何在使用英文為第一語言的政府工作？新加坡在1965年獨立時，新加坡政府選擇以英文作為行政用語，李光耀認為選擇英文為工作用語能避免種族衝突，對領導人而言，這個做法是出於實際的考量，也是新加坡求生唯一的選擇。這項政策導致南大必須做出抉擇，繼續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或是同時使用英文和華文教學。南洋大學一直嘗試保留華文為教學媒介語，最終不敵政策所趨。以實際面而言，在國家的政策下，南大畢業生若選擇留在新加坡工作，出路多為華文教師、私人公司中的華語工作者。文憑無用論的爭議，導致70年代許多華文中學的學生自費補習英文，選擇進入新加坡大學讀書，而非到南洋大學學習。華文的社會地位在大趨勢中日漸衰微。

（二）重新正視華文教育

在一個華人人口占八成的國家，如何提升華人的華文能力是當前最重要的挑戰。重新正視華文在外顯因素上是中國的崛起，內在因素則是「根」的發揚。學習華文和讓它成為來自不同方言籍貫的新加坡人的母語，部分動機是經濟，而究其本質仍與政治密切相關。華文被逾13億中國人及海外華人認為是共同的語言。²⁹70年代末，新加坡政府發現華人子弟的華文能力不佳，於是數度調整有關華文教學的政策，包含雙語政策的施行內容及華語運動。李光耀對此提出：「最困難的決策是處理有關根植於人民的心底的文化及感情問題，例如：語言課題。2009年人民行動黨慶祝成立五十周年，我回答記者的同樣問題時仍舊這樣說：『雙語政策是我這麼多年的政治生涯中推行的最艱難的政策，我至今還在不停地解決問題！』」自1979年以降，關於華文教學的政策在教育制度上做了六次檢討，其中包含四次針對華文科的教學改革。華文教育政策的調整次數是新加坡所有國家政策中最頻繁的，這些變革的目的是平衡國家、個人、族群之間的關注點。³⁰時任「華語運動」主席林少芬說：「中國改革，市場開放，肯定對新加坡的華文有很大的幫助。……新加坡的華文低落已經是公認的事實，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身為華人、身為對華文有感情的每一個人，我們能做什麼？力挽狂瀾可能做不到，但各自出一點力，還是應該的。」她的發言可以表示當前政府對於華文教育的立場。對於國家而言，盼望新加坡所有的華人家庭，能夠透過說華語對傳達文化起積極的鼓勵作用，學習中華文化裡更深層次的價值觀。³¹

²⁸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80。

²⁹陳慶文，〈陳慶文：新加坡的複雜語言環境〉。《聯合早報網》2016.06.09。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609-626956>。閱讀日期：2016.06.10。

³⁰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227。

³¹潘星華，〈林少芬談新加坡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軟實力不能硬包裝〉。《聯合早報網》2008.06.08。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face2face/story20080608-28421#sthash.iygHVHIF.dpuf>。閱讀日期：2016.05.09。

四、結論與建議

1955年，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南洋大學正式成立，歷經改制後於1980年正式退出歷史舞台。其運作近半甲子的生命除了象徵新加坡華人社會致力於華文教育的精神以外，更彰顯了中華文化的傳承。國家政策的走向與政治發展有關，以當代社會背景而論，早期的英殖民政府在政治因素下不樂見南洋大學的創立。新加坡建國後，以李光耀為首的新加坡政府亦在政治因素的考量下，讓南大併入以英文為主要媒介語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其中，新加坡政府強力推行的雙語政策影響華文教育甚鉅。該政策實質上側重英文教育，促使華文成為弱勢的一方。筆者認為，當代新加坡的國家政策偏重塑造新加坡人的共同意識，以英文為主要用語，是以輕忽了華文教育的重要性，帶給華文教育莫大的衝擊。這亦是南洋大學具有代表性的因素，其展現了華文困境的縮影。然而，因應國際政治局勢的演變，及重視華人社會的本質之下，新加坡政府重新正視華文的重要性，在施行的過程中不斷調整華文相關政策，期許華人子弟在華文的使用及表現上更出色。綜上所述，即使南洋大學不復存在，但是它帶給新加坡政府及華人重要的課題，華人當有學習華文的意識，並透過學習華文延續文化本質。教育事業百年樹人，在著眼國家利益的同時，更應兼顧民族文化，並肯定華文教學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性。

參考資料

原始資料

- [1] 中央社新加坡卅日專電，〈南洋大學昨日盛會慶祝校舍完成〉。《民聲日報》中華民國47年3月31日：C4。
- [2] 泛亞社新加坡廿一日電，〈南洋大學籌募基金華僑捐助踴躍〉。《民聲日報》中華民國43年3月23日：C2。
- [3] 英倚泉，〈南洋大學開學以後〉。《民聲日報》中華民國45年3月24日：C3。

專書

- [4]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我一生的挑戰 新加坡雙語之路》，台北：時報出版，2015。
- [5] 周兆呈，《語言、政治與國家化：南洋大學與新加坡政府關係 1953-1968》，新加坡：八方文化創作室，2012。
- [6] 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南洋大學史料匯編編委會》，馬來西亞：馬來亞南洋大學校友會，1990。

期刊論文

- [7] 施正鋒編，《語言政治與政策》，台北：前衛出版社，1996。

- [8] 古鴻廷，〈新加坡南洋大學的改革與關閉〉，《南洋問題研究》（2003，1）。
- [9] 利亮時，〈1950年代新加坡的政治、教育與種族矛盾：以南洋大學的成立為例〉，《興大歷史學報》（2006，17）。

網路資料

- [10] 吳英成，〈新加坡雙語教育政策的沿革與新機遇〉，
<http://www.ntcu.edu.tw/taiwanese/ogawa100/a/tsuliau/14.%E5%90%B3%E8%8B%B1%E6%88%90-%E8%AC%9B%E7%BE%A9.pdf>。閱讀日期：2016.05.25。
- [11] 李明旭，〈對新加坡雙語政策和華文教育的思辨〉。《李明旭的個人空間》〈
http://blog.huaxia.com/html/20/709720_itemid_3191.html〉。閱讀日期：2016.04.25。
- [12] 唐漢明，〈王賡武報告書筆下無情〉。轉引自《新加坡文獻館》〈
<http://www.sginsight.com/xjp/index.php?id=5779>〉。閱讀日期：2016.04.26。
- [13] 陳慶文，〈陳慶文：新加坡的複雜語言環境〉。《聯合早報網》2016.06.09。
<http://www.zaobao.com.sg/forum/views/opinion/story20160609-626956>。閱讀日期：
2016.06.10。
- [14] 潘星華，〈林少芬談新加坡發展文化創意產業 軟實力不能硬包裝〉。《聯合早報網》
2008.06.08。 <http://www.zaobao.com.sg/special/face2face/story20080608-28421#sthash.iygHVHIF.dpuf>。閱讀日期：2016.05.09。

致謝

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楊秉煌老師指導。

作者介紹

1. 余玉婷，Yu, Yu-Ting，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60285004I@ntnu.edu.tw。